



中古汉语 “完成”语义范畴研究

Research on “Completion” Semantic Category
in Medieval Chinese

帅志嵩 著



商務印書館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中古汉语“完成”语义范畴研究

Research on “Completion” Semantic Category
in Medieval Chinese

帅志嵩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汉语“完成”语义范畴研究/帅志嵩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7-100-10548-4

I. ①中… II. ①帅… III. ①古汉语—语义—研究—
中古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713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古汉语“完成”语义范畴研究

帅志嵩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548-4

2014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1¼

定价: 62.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次

目录

What then is time? If no one asks me, I know.

If I wish to explain it to one that asks, I do not know.

—Saint Augustine, *Confessions*, XI, XIV.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XI, XIV

序

这部书稿的前身，是作者七年前在北京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如果算上之前的选题和写作，到如今正式出版，前后花了差不多十年。因此，说这是一部十年磨一剑之作当不为过。学生要老师写序，很难拒绝。但对于极少写序的我来讲，却一时不知该如何下笔。我想，本书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的学术著作，读者必定是专家，其优劣得失，当会自做判断，实在不需要再画蛇添足，说不定还会造成误导，不如说点儿“题外话”。如果就我与作者的师生缘分唠叨几句，或许可以从侧面起到助读的作用吧。

2002年初，我受系里的委派到汉城（现首尔）韩国外国语大学担任为期一年的“外国教授”，教中文系本科生高级汉语和研究生汉语史的相关课程。3月份，照例是国内研究生录取月。不久从北京传来消息说，本年博士研究生考生的外语多不达标，教研室打算根据专业课成绩，为每位“博导”破格录取一名，为此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看到自己名下的拟录学生帅志嵩这个名字时感到陌生。因为每年报名前，通常会收到一些来信，或是考生“毛遂自荐”，或是同行师友推荐高足，而志嵩皆非。教研室转来的考生信息太过简略，令人难以做出录取与否的决定。于是我给志嵩写了电邮，要他对自己的情况做更多的介绍，信中直截了当地对其英文能力能否满足在北大学习的需要表达了担忧——多半由于个人的“惨痛”经历，我以为，掌握国际通用语英语，更多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是21世纪学者的基本素质。志嵩回信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但不卑不亢、颇为自信的语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好像特别说到糟糕的英文考试成绩并不反映自己的实际能力。考虑再三，我决定给他一个机会。让我做出这个决定的，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他来自自我学习和工作十有一年的四川大学，对那里的学风和基础学术训练水平我有一定的信心；二是志嵩来自农村，自学起步，能走到今天，当有过人之处。

入学后的志嵩，在学习上确有一股蛮劲儿。他不但自主地听了许多老师的课（这是北大最值得称道的特色），其中包括一些难度较大的理论课，大

大超过了培养计划的要求;还主动阅读了大量文献,其中包括不少西文学术论著(他的英文阅读能力在此得到证明)。收获最终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上。当志嵩打算以汉语完成范畴(标记)从无到有的历时发展变化为题时,我眼前一亮。不仅仅是由于其选题的前沿性,还在于其理论色彩和难度,均在当时的汉语史研究中难得一见。我也不禁为他捏一把汗。为了攻克其中的难题,志嵩主动推迟毕业一年,以便有更多时间寻找适合的理论工具,有更多时间对事实做更深入的发掘及更合理的解释。还是得用那句老话:功夫不负有心人。论文受到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这不仅令志嵩顺利拿到了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还为其在北京找到合适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借此机会,我要感谢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崔希亮教授和该校对外汉语中心主任张博教授。由于他们的慧眼,当年志嵩在申请《世界汉语教学》杂志编辑部的职位时,二位力排众议,将志嵩收入麾下。如今志嵩主持了国家(1项)和教育部(2项)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还入选了2012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志嵩以他一贯的笃实和勤勉,在汉语语言学人才济济的北语站稳了脚跟,没有辜负这些伯乐的期待。作为曾经的导师,我亦与有荣焉。

是为序。

朱庆之

2013年春于香港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研究对象	1
1.2 研究意义	2
1.3 研究现状	3
1.4 研究目标、材料和方法	8
1.5 术语界定	12
第二章 中古汉语“完成”语义的表现形式	15
2.1 基本原则和方法	15
2.2 “完成”语义表现形式	18
2.3 “完成”语义表现层次	41
第三章 中古汉语“完成”语义的表达体系	45
3.1 四级结构层次	45
3.2 三级表达体系	55
3.3 被动句	68
3.4 表达模式	72
3.5 语义范畴	74
第四章 “完成”语义标记的衍生和演进	80
4.1 语义标记	81
4.2 “完成”语义标记的衍生	83
4.3 语料同质性及分类	93
4.4 “完成”语义标记在中古汉语的表现	95
4.5 “完成”语义标记在近代汉语中的演进	115
4.6 两种不同类型文本中的比较	122
4.7 “完成”语义标记演化的单向性过程	125
第五章 “完成”语义隐性范畴的历时演变	141
5.1 对作格动词研究的检讨	142

5.2 使成结构及其上古表现	157
5.3 “斩”	170
5.4 “杀”	186
5.5 “败”	220
第六章 “完成”语义范畴间的互动	233
6.1 “完成”语义标记的演进对语序的影响	233
6.2 动结式的衍生过程	258
6.3 “王冕死了父亲”的衍生过程和机制	278
第七章 结语	296
参考文献	303
后记	327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对象

本书主要研究中古汉语“完成”语义范畴的共时呈现及其表达形式的历史演变。

中古时期(东汉—南北朝)是汉语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从汉语研究的现状来看,与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相比,不管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中古时期的研究又是最薄弱的。这可能和学术历史有关,如过去对汉语史的分期,大致可以分为三派:1. 上古、中古、近代三期(王力,1958);2. 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四期(太田辰夫,1988);3. 古代和近代两期(吕叔湘,1985)。从以上的各种分法中,“我们看到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魏晋南北朝的地位很暧昧,在四分法中和其他时期等立的,在三分法中则和唐五代甚至宋代合并为一期,在二分法中则又归入古代,结果魏晋南北朝是从古还是就今,还是独立出来,变成了颇为令人困扰的问题”。(魏培泉,2000b:200)尽管有不少专家和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古汉语的重要性,但仍有大量的语言事实有待于进行深入研究。汉语的历史相当长,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加上能力有限,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个时代的语料进行综合考察,所以本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古汉语。在对中古时期的语言现象进行充分描写的基础上,再和中古前后的语言事实进行比较:向前上溯至上古汉语,往后联系近代汉语。我们试图立足中古,联系两头,做到既重视语言事实的充分描写,又兼顾语言的历史演变。

为什么不说我们的研究对象为“完成体”的历史演变呢?

已有不少学者就汉语体标记的产生和来源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如太田辰夫(1958)、梅祖麟(1981、1999)、曹广顺(2000)等,他们主要关心某一句式或标记的来源,基本看法是汉语完成体标记产生于晚唐五代。但是研究

体标记的产生过程,必须上溯到中古时期。郭锐(1997:174)直接指出:“现代汉语的过程标记是在中古时期逐渐产生的。”然而,从历史语法的角度看,如果仅限于有标记形式会遗漏很多重要的语法信息,所以我们打算从语义入手,将所有表达“完成”语义的方式都纳入研究范围。根据语言自足的观点,不同时代的人们都能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思想,那么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体标记产生以前,古人是怎样表“完成”语义的?除我们已经知道的汉语完成体标记由“完成动词”,如“毕、竟、已、讫”发展为完成体外,还有没有其他表达方式?如果有,有哪些?它们在结构、体系上以及相互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这些语义成分在中古时期的发展演变有什么不同?诸如此类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所以我们立足于中古汉语,以“完成”语义作为研究对象,希望能够为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做一点工作。

1.2 研究意义

现代汉语研究的事实表明,在语法研究中太拘泥于形态标记往往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汉语语法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我国某些兄弟民族语言和西方语言里边用形态成分来表示的概念,汉语里边或者不做表示,或者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吕叔湘主编,1980:1)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越来越关注语义,“格”语法理论从研究名词或代词的语法范畴到着重分析句子的语义关系就是这种转向的一个典型。

对于“体”(aspect)^①,“从认为它是仅用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示概念的现象,到认为它可以通过虚词来加以表示,乃至至于认为在广义上它是词汇的和概念的(语义的)范畴,这代表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方向。”(左思明,1998:7)在国内语法学界,陈平(1988)对体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他把时间系统看成一个意义系统,一个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意义系统。他认为时间系统本质上是语法范畴,同时他把语法形式特征置于“伴随”地位,这已经显露出偏重语义的倾向。而且,无论是他着重论述的“时相”,还是另外两元“时制”和“时态”,都是从意义角度来解释的。

^① 陈国华(2013)指出,国内语法学界通常把 aspect 译成“体”,但无论从词源或所指的角度来看,aspect 都没有“体”的意思,因此,应该把“体”译成“态”。为方便论述,本书依照传统的称谓,依旧把 aspect 称为“体”。

杨永龙(2001)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

我们不妨把“体标记”这一概念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狭义的体标记指表体的形态,是完全虚化的纯语法形式;广义的体标记指所有表体形式,包括纯语法形式、词汇形式、句子结构等,只要是表达体意义的“标记”或“记号”(mark),均称作“体标记”(aspect mark)。(杨永龙,2001:23)

杨著指出,完成体意义的表达除了常见的表体副词、助词、语气词和尚未完全虚化的动词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手段,例如不用任何显性标记的“零形式”,在一定语境中也可以表示完成体意义。

因此,我们选择从语义入手,而不是仅仅关注某一形态表达,既符合当今体貌理论精神,也和当今语言学的发展趋势相吻合。

此外,将所有表达“完成”语义的方式都纳入考察范围的好处是,我们不但可以看出表达同一功能的语义成分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和演变,而且可以从系统论的角度考察这些成分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不再仅仅局限于表达这一功能的语义是实词还是虚词,是词、词组还是小句,这样的语义场研究更符合系统论的精神。也唯有这样,才能更加保证语义的系统性和自足性。否则,我们的研究有可能是不完善的,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够充分的。

Dowty(1991:575)指出,从实际生活来看,人们可以不关心施事、宾格等成分,但是人们十分关心“某物是静止的还是移动的,某物以某种方式改变与否,事件完成与否,还有活动是否产生了结果”等。因此,如果能将不同时期“完成”语义的表现和历史演变情况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轨迹,那么我们不但能更加完善地描写出汉语历史的发展脉络,而且可以从认知的角度了解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表达方式。

鉴于此,本书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希望能对汉语史的研究有所帮助。

1.3 研究现状

对“完成”语义范畴的研究与动词的分类以及“体”^①研究密切相关。

^① 对这一问题进行概述的文章较多,如龚千炎(1995)、Zhang(1995)、戴耀晶(1997)、金昌吉和张小茜(1998)、顾阳(1999)、杨素英(2000)、杨永龙(2001)等均有论述。我们在此只是扼要叙述研究状况,详尽评介请参 Sasse(2002)、陈前瑞(2008)。

体貌研究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古希腊。根据 Binnick(1991),具有现代意义的体概念——体是由完整体和未完整体的对立构成的,直到 19 世纪中叶才出现在 Miklosisch 的著作中,并由 Jakobson 在 1932 年严格地建立起来。体首次出现在英语中是 1835 年,由斯拉夫语的语法术语引进到西欧语法中。

情状类型建立在人类对世界事物的认识上,因而具有共通性。人类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会区分状态和活动。Vendler(1957)从英语的词性角度而非从结构的角度提出了动词体类型的四分法:状态(State),活动(Activity),完结(Accomplishment)和达成(Achievement)。Vendler 的四分法在语言学界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自此,语言学家普遍采用三个建立在时间概念基础上的两元标准来区分动词类型。这三个两元标准为:[+/-动态]([+/-dynamic]), [+/-终结]([+/-telic]), [+/-瞬时]([+/-punctual])。

Comrie(1976)是第一部将体作为普通语言学的问题来研究的著作。书中对体的定义、时和体的区分、体的系统等重要问题都做了精辟的论述。体的定义是:“体是对某一情状的内部时间结构的不同的观察方式。”(Comrie, 1976:3)体关心的是某一情状的内部时间成分,完整体(perfective)则把某一情状做整体性观察。由于 Aktionsart 不关心说话人的观察角度,而只是关心动词的内部时间性质;Aktionsart 是客观的,通常动词都有词汇体,但是当动词和某些名词短语或副词联结时,就获得了不同的体类。Comrie 的观点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的体貌研究基本上沿着他的思路进行,如 Smith(1991)、Binnick(1991)、Michaelis(1998)等。此外,Verkuyl(1972、1993)、Hopper & Thompson(1980)、Langacker(1987b)、Dik(1997)、Dahl(1985、2000)等分别从形式、功能、认知、语义、类型的角度对体貌进行了研究。

至此,从事体貌研究的学者在以下几方面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一)体貌性和界限相关。因此体貌方面的所有理论在谈论界限时都关心语言的情状编码方式。

(二)体貌性是一个更大的范围,不仅在语法范畴内,而且在语法与词汇之间也被相互影响。因此,Smith(1991/1997:5)指出:“体是一个在语言学范畴中表现语义的领域。”

(三)有许多因素共同影响了体貌性,不仅是句法、词汇影响了语义解释,而且上下文信息也造成了体貌的理解,所以这就需要一个超越语言学科范围的理论。

由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体貌不仅限于形态范畴或者显性的功能范畴,即体算子,而且可能与隐性范畴,如谓词相关,所以当今体貌理论不再认为体貌的语义仅仅与充当体算子的屈折成分相关,而且与情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体貌意义具有合成性的特点。

中国传统语言学中“体”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近几十年来,才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尽管在这个领域中现在还有争议,但学者们也达成了不少共识,可以说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体貌理论框架。所谓动词的体或体貌均由英语 aspect 翻译而来。究竟称其为“体”还是“貌”,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尚无统一的标准,有将 aspect 译作“情貌”或“态”的(见温知新、杨福绵,1985),吕叔湘主编(1980)在讨论某些副词及动词助词时亦间接提到“事态”“状态”,陈平(1988)使用“时态”,胡明扬(1996)将 Comrie(1976) *Aspect* 一书译作“动态”。目前一般采用“体”来对应 aspect,如高名凯(1960)、李临定(1990)、宋玉柱(1996)、张双庆主编(1996)等。

早期汉语体貌研究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70 年代末,属于初创时期,代表人物有黎锦熙、王力、吕叔湘、高名凯、龙果夫、雅洪托夫、张秀等。这一时期的体貌研究侧重对西方时体理论的引进、消化、改造,建构汉语自身的时体范畴体系,表现出较强的理论色彩。虽还谈不上深入和系统,并带有初创时期的痕迹,如时体框架的构建缺乏客观标准,具体描写相对薄弱等,但是这些成果为后来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关于汉语有无“时范畴”的理论探讨对后来的影响尤为深远。王力、高名凯等提出的“汉语有体无时”观点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这一观点的主导地位一直延续至今,某些体形式(如“了”、“着”、“过”、动词重叠)也逐步得到了公认。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汉语体貌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汉语的体貌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深化,代表性成果有马庆株(1981)、邓守信(1986)、陈平(1988)、龚千炎(1991)、郭锐(1993、1997)、戴耀晶(1997)、陈前瑞(2008)等。

马庆株(1981)的动词分类系统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根据动词带时量宾语的歧义类型,结合动词的语义特征将动词分成四类。虽然马庆株没有为他的分类贴上情状标签,但实质上是对动词进行的情状分类。

邓守信(1986)明确提出:“不同的语境基本上是句子谓语的分类,而非动词本身的分类,虽然与动词分类有着相当大程度的关系。”他根据 Vendler 的分类仍将情状分为四类,并指出:活动表明纯粹的动作过程,如“走路”;完结则表明达到了动作的目的,如“走到学校”;达成不牵涉动作只表明某种情况的出现,如“干了”;状态只表明一个情况的存在,如“快乐”。

陈平、龚千炎都是以整个时间结构系统为研究对象。陈平重点分析了时相(情状类型)与汉语动词次类的关系。他划分情状类型所依据的是去掉时体标记以后的整个句子,根据[+/-静态](state)、[+/-持续](durative)、[+/-完成](telic)三对区别性特征的各种组合方式,将汉语句子表现的情状分成状态、活动、结束、复变、单变五种类型。

戴耀晶则单就某一个子系统(时系统或体系统)进行了考察。戴耀晶(1997)深入考察了汉语的体系统,并采用语义分析法,详细讨论了完成体和非完成体两大类中的六种体,对每一种体形式所反映的体意义都提取了数项语义特征,从而以简明的语义驾驭了各类体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特别强调了时、体范畴与时、体语义的区分,指出前者总是与一定的形态形式相关,而后者则可通过词语形式、形态形式、强调形式、格形式、言语环境及说话者心理等各种手段来表现,因而在任何语言中都有所反映。(金昌吉、张小荫,1998:34~35)戴耀晶认为:“情状的研究必须分层面(level)考察,至少应该区分动词层面的情状与句子层面的情状。”^①他还分别对动词和句子进行了情状分类。

相比较而言,郭锐(1993、1997)的研究显得与众不同。郭锐(1993)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并对孟琮等编的《动词用法词典》所收动词进行过程结构分类,他把汉语的动词按过程结构的不同分成了十个小类,其中有三个典型类。后来,郭锐(1997)进一步对动词的过程结构分类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谓词性成分的外在时间性分为过程和非过程两种:过程指谓词性成分实现为外部时间流逝过程中的一个具体事件,这种谓词性成分一般带有“了、着、过、在、正在、呢”等时间性成分;非过程指谓词性成分不与时间流逝发生联系,只是抽象地表示某种动作、状态或关系。

陈前瑞(2008)主要从系统的角度分析汉语体貌的句法语义特征,从话语的角度探寻体标记的功能、基于语料库定量分析体貌现象,构建了一个情状体、阶段体、边缘视点体、核心视点体的四层级汉语体貌系统。

此外,从方言和民族语言的角度研究体貌的成果分别体现在胡明扬主编的《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1996)、张双庆主编的《动词的体》(1996)以及戴庆厦主编的《中国民族语言文学研究论集》(语言专集2001)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汉语体貌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重视理论构建。国内当今的体貌研究更多地直接受到 Comrie

^① 黄美金(L. Huang, 1988)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她认为:“‘态’实际上不应局限于‘时间’与‘动词’的狭隘范畴中,而应扩大至动词组、句子、段落,甚或更大的言谈单位。”

(1976)、Smith(1991)、Olsen(1997)的影响,但不是盲目的搬用,而是在借鉴外来理论的同时结合汉语实际,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方面以戴耀晶(1997)和陈前瑞(2008)为代表。

(二)主要关注有标成分的时体功能。由于“体貌”这一概念直接从英语转译而来,而英语是形态比较丰富的语言,因此体貌研究者大多认为体范畴仅用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示,研究文章也就更多地关注“了、着、过”等标记成分。

(三)重视语义表现。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在语法分析中越来越注重语义成分,如格语法、生成语法。陈平(1988)实际上把时间系统看成一个意义系统,一个通过语言形式而表现出来的意义系统。戴耀晶(1997)深入考察了汉语的体系统,书中采用语义分析法,详细讨论了完成体和非完成体两大类中的六种体,对每一种体形式所反映的体意义都提取了数项语义特征。

但是,当前的体貌研究还有很多不足。

首先,对体貌问题的研究更多地表现在理论语言学界和现代汉语学界,包括陈前瑞(2008),尽管在研究中结合历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就我们来看,还是属于现代汉语和理论语言学范围。

其次,大多仅仅关注有标成分,而忽视了对无标记成分的研究。汉语体标记,即使在现代汉语中有时候并不是必需的。如果我们仅仅关注“了、着、过”等有标记成分,肯定会遗漏很多语言事实和现象,从而影响解释力。现代体貌研究的新进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体貌和情状、句子密切相关,体貌范畴不仅仅是形态标记的问题,其作用相当于算子功能。陈平(1988)曾指出,句子的情状取决于所有句子成分词汇意义的总和,其中动词是基础,其他成分也起着重要的选择和制约作用。因此我们只有从系统的观点出发,才能够全面阐释汉语中与时相、时制和时态特征相关的各种语法现象。可喜的是,杨永龙(2001)在研究中已经扩大了体貌研究范围,把副词、语气词等也纳入了体貌范畴:有特定的体标记就可以表示特定的体意义,但没有某一特定的体标记并不等于不具有某种体意义;完成体意义的表达除了常见的表体副词、助词、语气词,尚未完全虚化的动词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手段,例如不用任何显性标记的“零形式”,在一定语境中也可以表示完成体意义。加强对不带标记现象的研究,必将深化我们对带体标记的现象以及体现象本质的认识。

最后,对体貌组合效应关注得不够。Vendler(1957)的论著发表之后,许多语言学家发现,情状动貌的性质不仅仅取决于动词本身,而且取

决于动词与其他什么样的成分联结而构成句子。Verkuyl(1972)、Dowty(1979)讨论了动貌的合成性质。因为体貌的合成性不仅仅表现在动词上,“情状的研究必须分层次(level)考察,至少应该区分动词层面的情状与句子层面的情状,二者是不相同的,相互之间存在着体现(realization)与被体现的关系”。(戴耀晶,1997:13)也许是因为这种研究的难度大,所以研究者稀少。不过,不重视研究体貌的组合效应显然不能很好地解决汉语体貌的实际问题。

上面我们简略地概述了体貌研究的基本状况。应该说,体貌研究方兴未艾,从一系列博士论文和相关论文集的不断出版可以窥见一斑。然而从汉语史角度研究体貌的文章相对较少。曹广顺(1986、1987、1995、1998、2000)、蒋绍愚(1999、2001、2003)、梅祖麟(1981、1988、1991、1999)进行了相关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不过这些文章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描写某种语法规式的历史来源和演变动因。真正把体貌理论全面应用于汉语史研究的,笔者认为应该是杨永龙。杨永龙(2001)中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从句法结构、事件类型、情状类型、时制结构等多方面对《朱子语类》中表达完成体意义的若干副词、助词、语气词、完毕义动词进行描写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进行古今比较,详细阐释了以《朱子语类》为代表的近代汉语中完成体的发展和演变。然而面对丰富的历史语料,汉语史学界对体貌的研究仍显得十分薄弱。由于语言情状类型建立在人类对世界事物的认知上,因此弄清楚不同时代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在语言中的反映不仅能够将汉语史的研究置于普通语言学的视野内,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汉语体貌范畴由古到今的历史演化和变化机制:汉语的体貌范畴如何从隐性范畴发展出显性范畴的?其时代性表现如何?内在的动因和机制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对每个时代的语料进行扎实的研究。

1.4 研究目标、材料和方法

语言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某一语言现象的变化是跟所处时代的其他成分相互关联的,这就决定了语言研究不能仅仅追溯某一形态、某一语法成分单纯的线性发展过程^①,而是必须把相关的词汇、语法现象联系起来。我们认为,以往的汉语史研究在词汇和语法的结合上不是很令人满意:词汇研究

^① 我们当然不否认描写语法线性发展的过程的重要性。